



財團法人凱達格蘭基金會 新台灣國策智庫通訊

第 155 期

2026 年 7 月

- 鄭麗文「親中和美」路線與國民黨兩岸戰略的再檢視 2
- 高鐵延伸宜蘭是務實的決策 4
- 2026年中共對台政策及統戰作為觀察 6
- AI時代台灣產業結構之探討 8

編者的話

顏建發教授分析鄭麗文的「親中和美」路線，試圖在美中競爭中建立非排他性策略，而其可行性取決於三個相互交織的信任結構：1. 北京是否接受中華民國政治框架下的交流模式；2. 美國是否認為其互動不構成戰略風險；3. 台灣社會是否認為此路線不會削弱主權與安全自主性。最終的問題並非「親中或親美」，而是能否在三方結構性不信任中，維持最低限度的制度性信任平衡。只是，若平衡成立，「親中和美」可成為中介型戰略；若失衡，則可能轉化為政治風險來源。

前宜蘭縣政府計畫處處長李守正說明，高鐵延伸宜蘭政策的濫觴，約始自 2019 年 10 月間交通部林佳龍前部長，表達交通部刻正研議「高鐵延伸宜蘭」方案，並以會議結論為依據，據以改提北宜高鐵為解決方案送院。如此一來，「高鐵延伸宜蘭」驟然成為交通主管部會改善北宜鐵道交通「依法有據」提出的新政策構想，其後，迄於今，用了將近七年的時間，在先後完成國家重大經建計畫先期可行性評估、環境影響評估及綜合規劃，終獲行政院核定興建。

凱達格蘭基金會《新台灣國策智庫》兩岸研究小組，2026 年 7 月 20 日「2026 年中共對台政策及統戰作為觀察」圓桌論壇會議討論，統戰很難一對一去制止、防禦，政府必須有全面策略，現在統戰形式、戰場已經不計勝數，重災區宗教

統戰伎倆、類型如何讓民眾有感也要鋪陳，需要拿出全盤策略，否則每一個議題要單獨對應有其困難，例如識讀中國課程排在大學已經太慢，應該小學就開始、中學就要加強。中共統戰手法包括議題議程的設定、經濟的收買拉攏、社會的分化滲透路徑，包括反分裂法、民族團結法等法律脅迫，其目的對候選人、對選舉介入，引發台灣內部對立紛爭，製造同情聲量與支持力量，最終戰略節點在感知的誤導改變，以致癱瘓政府決策、施政乃至兩岸的主導權、主動權。

2026 年 7 月 30 日凱達格蘭基金會《新台灣國策智庫》經濟研究小組，討論「AI 時代台灣產業結構之探討」，認為台灣的思維首先是產業結構與佈局要有長期思考，即使要維持傳統製造業也要以「高階製造」為目標，透過高階製造創造高薪就業機會。其次要建立完善的產業生態系，以產業多元化解決 K 型經濟趨勢。第三要優化 GDP 結構，改變過去的製造業思維，邁向先進國家的經濟結構、實質提高生活品質。第四支持擴張性對外直接投資，加速對外投資善用全球人才、知識與資源。第五要強化創新精神和環境，產業持續升級、差異化。第六是勞動力的優化，良好的勞動條件需要建立在高技術水準與高資本累積上，具備高知識與技術含量的高階製造與服務業才是優化勞動條件的基礎，AI 的發展不必然不利於就業與勞動，AI 的善用也可能是產業與企業的利多。

鄭麗文「親中和美」路線與國民黨兩岸戰略的再檢視

顏建發

健行科技大學企管系教授退休

一、國民黨疑美論的結構性來源

美國對台政策核心仍在於維持台海和平與區域穩定，並非針對特定政黨。固然美國對《台灣關係法》與「維持現狀」承諾仍具制度延續性，但「美國優先」框架下，美國對盟友強調防務負擔與戰略貢獻，確實使得台美關係沾染交易性特徵，尤其與 1979 年斷交經驗的歷史連結，讓「美國是否可能在危機中放棄台灣」成為政治認知的變數，並成為「疑美論」的動員資源。鄭麗文對美軍售與安全承諾的質疑，並非單純反美，而是建構雙重限制論述：台灣既不應完全依賴美國安全承諾，亦不應完全依賴對抗性兩岸政策。

二、鄭習會與政黨外交的內涵

習近平於北京會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為國共領導人相隔十年後再次會面。中方強調兩岸同屬中華民族、反對台獨。此一會面對北京而言是延續對台溝通策略，對國民黨而言則是重申具備兩岸溝通能力。然而，國共政黨外交雖可作為兩岸非正式溝通機制，卻不具備政府間談判的法律與政治授權。其功能主要體現在象徵與溝通層面，並未能轉化為降低衝突的實質機制。

三、訪美行程與「雙重槓桿」的難題

鄭麗文的訪美強調國民黨作為兩岸和平橋樑的角色，其核心張力在於：如何在維持與北京

溝通的同時，不被視為接受北京的政治定義。若完全靠攏北京將削弱美國體系內的可信度；若完全接受美國對中戰略框架，則會削弱兩岸和平論述的正當性。其路線試圖建立「雙重槓桿」模式——與北京維持溝通但不接受其主權定義，與美國維持合作但不完全依賴其安全承諾——顯然將面臨落實上的難題。

四、美方戰略論述的多元性以及其學術與戰略實務的落差

訪美期間鄭聲稱涵蓋國會、行政部門、智庫與學術機構，由於其結果與原先接觸的預期落差甚大，引發外界對美方態度的解讀，但終究缺乏證據證明美方採取系統性降級接待；尤其外交互動層級受議程與保密需求影響，不能直接等同於信任程度之變化。然而其與北京和華府的不同互動方式，仍會影響台灣內部對其路線的認知評估。同時「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艾利森與鄭麗文交流時，固同意其強調美中競爭不必然導致戰爭，台灣應扮演降低衝突的中介角色的論述，但終究它只代表美國多元立場的一支，更何況本質上學術論述與政策認可也不可同日而語。

五、結語

鄭麗文的「親中和美」路線，試圖在美中競爭中建立非排他性策略，而其可行性取決於三個相互交織的信任結構：1. 北京是否接受中華民國

政治框架下的交流模式；2. 美國是否認為其互動不構成戰略風險；3. 台灣社會是否認為此路線不會削弱主權與安全自主性。最終的問題並非「親中或親美」，而是能否在三方結構性不信任中，維持最低限度的制度性信任平衡。只是，若平衡成立，「親中和美」可成為中介型戰略；若失衡，則可能轉化為政治風險來源。

而以現況推論目前兩岸所處的戰略環境，不管短、中、長期，都看不到上述第 1 項和第 2 項存在的可能性；失衡成為必然。至於第 3 項，台灣社會固仍存有支持兩岸終極統一的聲音，但以北京與台北之間實力懸殊的態勢來看，大多數對於兩岸交流會削弱台灣主權與安全的自主性疑慮，仍無法去除；而這點在今年 11 月 28 日九合一選舉的造勢場合將可得到最立即的驗證。BT

高鐵延伸宜蘭是務實的決策

李守正

前宜蘭縣政府計畫處處長

行政院核定高鐵延伸宜蘭是一項公共政策的決策，有人贊成、有人反對，自不令人意外。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沒看到在野黨高聲批判，反倒是有執政黨員及前閣員，有的用辛辣謾罵的言語，直指是錯誤政策，必將反對到底云云；有的高舉無瑕的道德標準，要求當民團還在訴願中，且監察院也說決策有檢討空間，故不應在此時核定云云。相對照此時立法院種種恣意妄行、違背民主憲法的惡行，他們嚴責政府決策的舉止還真令人莫名其妙！

高鐵延伸宜蘭歷時六年餘研議

有力地形成高鐵延伸宜蘭政策的濫觴，約始自 2019 年 10 月間交通部林佳龍前部長授意黃玉霖前政次向宜蘭地方人士表達交通部刻正研議「高鐵延伸宜蘭」方案；將以 100 年經建會函覆行政院交議「臺鐵宜蘭線及北迴線改善方案先期規劃—臺鐵南港至花蓮提速改善計畫可行性研究」，以會議結論「說明項二之（三）」之要求（「交通部從公共運輸與整合運具規劃難度，審慎考量速度提升、公共運輸量達成、運具分派、地方發展、環境影響、財務分析、觀光發展及益本分析等因素，整體分析本計畫各項可能方案，並應通過環境影響評估，綜合考量可行後，再提綜合規劃報告，循行政程序報院核定」）為依據，據以改提北宜高鐵為解決方案送院。

如此一來，「高鐵延伸宜蘭」驟然成為交通主管部會改善北宜鐵道交通「依法有據」提出的

新政策構想，其後，迄於今，用了將近七年的時間，在先後完成國家重大經建計畫先期可行性評估、環境影響評估及綜合規劃，終獲行政院核定興建。一項重大建設，從政策構想提出，先後獲蘇貞昌、蔡英文、卓榮泰、賴清德等中央主政者的同意（起碼沒反對），並通過交通專業機構次第分明的研議規劃、跨部會局署的審查通過，在完成民主國家體制內的必要程序下，最終定案並獲核定通過。這豈容一人之謾言能夠推翻？！

政治掛帥是公共政策決策的務實工具

另外，謾言指高鐵延伸宜蘭是「肉桶政治」，是為選舉考量的說法亦是一竿子打翻重大公共工程對國家整體經濟建設的貢獻與長遠影響的任意指控。從上個世紀七、八零年代以來，公共政策學界對公共政策分析之一，有依理性方法（如 I/O 最佳最適化）、非理性方法（如博弈理論）及反理性方法（如政治掛帥）為區分的整合研究取徑；理性、非理性、反理性這些字眼都是公共政策知識社群內價值中立的名詞。「政治掛帥」雖稱之為反理性方法，但與好壞無涉。更重要的是，當代民主國家決策模型都是混合制度，包括各種方法的若干成分，而政治掛帥決策方法更是其中的主流。

亦即，公共政策決策前，專業的技術專家幕僚們用的是各種科學理性的方法，秉持價值中立，研析該公共政策（建設）應否成案、如何執行及執行規劃，但是，理性方法未必能掌全貌，

也未必成為最確實有用的方法，所以有非理性方法的應用（如博弈理論用於無線頻譜的分配）。而在完成了這些程序之後，最重要的，會是政治掛帥，因為它是護翼或是阻止公共政策完成的重要助（阻）力。

政策研定依章法 核定興建利全民

在我國，像是決定實施全民健保、以 BOT 方式興建高鐵，乃至加速貫通雪山隧道及國五完

工，最關鍵的決定力量與助力，都是政治掛帥。政治掛帥表達主政者的執政價值與偏好，這是執政者所為何由的根本之道。高鐵延伸宜蘭同高鐵延伸屏東，都是台灣共同體上的重大國家建設，都是為 2,300 多萬人民服務的交通設施，執政者核定興建，是善盡他們的職責。而現在有人吹噓其專業見解與立場的爭論，其實本該是在形塑政策的研議階段得到解決，而不是現在課題已經完成之際，你才突然醒來，四處放矢。BT

2026 年中共對台政策及統戰作為觀察

編輯部

編按：本文係凱達格蘭基金會《新台灣國策智庫》兩岸研究小組 2026 年 7 月 20 日「2026 年中共對台政策及統戰作為觀察」圓桌論壇會議紀錄摘要

泰國和韓國最近都受到假訊息困擾，日本和新加坡也在積極反制假訊息攻擊，假訊息攻擊問題最嚴重的就是台灣。台灣受到認知戰影響最直接、最嚴重，相對於其他國家台灣有主權爭議問題，使得假訊息問題的複雜性更為嚴重，因此瑞典哥德堡大學的研究報告，將台灣列為是假訊息攻擊的榜首。假訊息是敵人複合攻擊或全域攻擊的一環，像統戰一樣青蛙煮水地分化、誤導我們，中國經常威脅利誘台商統戰，邀請台灣年輕教師到新疆旅遊，以前統戰手法幾乎無所不包，現在則是精準式的對象與項目，認知戰結合統戰其影響更為可怕；中國對台灣施壓有經濟、國防、法律、資訊等多個面向的攻擊，灰色地帶的攻擊與作為層出不窮，特別是賴清德總統執政以來明顯加劇，對日本韓國的做法也是灰色地帶為主，例如黃海、釣魚台還有西南群島的侵擾就是灰色地帶。

有些人誤以為統戰不過就是宣傳，相信宣傳就會落入中共設定的議程與風險，但是統戰的目的不是只有說服和洗腦，統戰更是中共對內對外的政治整合工程，不管是對敵人還是朋友，統戰不只是結盟而是政治動員；統戰的範疇很大，幾乎沒有邊界，例如各界批判的「民族團結促進法」就是一個統戰法，只要看它是由統戰部主責就可一目了然；統戰最可怕是進入灰色黑色地帶，資訊的綁定、進路誤導、說服、審查，甚至就直接動員；雙城論壇以城市治理作為包裝，低政治的交流有穩定兩岸的好處，但包裝、走私的中共議程成為其統戰平台；統戰和包括認知戰的宣傳也用在對外的國際影響力，學術、文化、政治、僑務、經濟等領域都成為統戰舞台，像泰國華人的

文化血緣團體有影響力的就會被統戰，皇室與總理甚至受影響自稱有華人血統，多元自由民主的新加坡就好一點。

「一帶一路」債務陷阱的出現也和統戰關係密切，利用政治經濟的無形統戰網絡，以市場誘因和利益做為陷阱；中共有四個工具結合統戰對外影響，研究經費、自我審查、血緣地緣動員文化與民族情感敘述等，影響當地認知與公民主義；日本是成熟民主體制國家，中共利用高度民主自由，統戰分化美日關係、弱化民主體制、地方包圍中央、影響產業發展與引導歷史敘事，日本是法治國家的反制模式，就是外資審查、政策安全化，並提高親中民意代表的成本；日本各界對於中國擴張已經非常敏感，例如科技公司被中資入股併購，有錢的中國留學生成為新移民的影響，中國人的群體聚集效果更是醒目，有些社區有中企、中資落地影響環境，日本是不是法規還不夠嚴謹、還是民眾感受觀感問題，對中共相關人員企業都是負面觀感，使得日本有修法立法的動力。

新加坡是政府高度治理、威權集中，是官僚體制成熟運作的菁英治理，中共試圖菁英連結與利用經濟合作，因此新加坡最近通過防止外來干預法，規定與中方往來有義務提供往來資訊給內政部，以此來因應中國操作民族血緣訴求，包括民族團結促進法的統戰威脅；民主國家有言論自由、民主保障，韓國社會對中國影響力的警覺日增，日本力推經濟安保法，反應較慢但也算是亡羊補牢；中共對日本弱化其安全決策，新加坡則是影響其決策，我們台灣是中國影響力的震央，

中國對台灣就是赤裸裸的直接主權威脅，我們至少必須像新加坡立法防止統戰滲透。

台灣與日、新的大背景與文化不同，立法的推動可能要靠公民團體及公民社會動員，公民民主主義的動力才是最大的後盾；中共對台灣、美國及一些民主國家的選舉影響值得關注；光是靠主管機關的提醒，會有議題的疲勞、老化問題，如果每個議題被動回應就有效率遞減問題，如何避免政策疲勞甚至左支右絀現象，要有高層、全面策略；近年來經濟對中依賴降低值得肯定，但兩岸貿易絕對值卻增加，可能是因為資通訊等高價產品比重增加，這也使得經濟完全脫鉤有疑義，或者形成對中籌碼減少的問題；中共海警船軍機繞台不增不減，穩定情況也許與中美休戰或者伊朗戰事關係有關，七月實施的民族團結促進法對台灣還是有些影響。

韓國的情況受到不只中共還有北韓影響，政治文化方面的認知戰非常嚴重，對政治菁英統戰有從上而下的型態，如果由下而上就很危險，韓

國政治菁英受到中共影響，原因之一是因為經濟資源連帶關係的影響，學術界也有受到中國利益左右的現象，李在明政府執政後韓國受到中國影響加大；韓國對中的應對看來很吃力必須加強，最顯著的統戰可以看到中企取代外商的地位。統戰的方式、細胞無所不在，很難一對一去制止、防禦，政府必須有全面策略，現在統戰形式、戰場已經不計其數，重災區的宗教統戰伎倆、類型如何讓民眾有感也要鋪陳，需要拿出全盤策略否則每一個議題要單獨對應有其困難，例如識讀中國課程排在大學已經太慢，應該小學就開始、中學就要加強。一個開放自由的民主社會，在保障人權、公民權、言論自由的同時，我們要慎重因應，模擬中國介入地方選舉，中共統戰手法包括議題議程的設定、經濟的收買拉攏、社會的分化滲透路徑，包括反分裂法、民族團結法等法律脅迫，其目的對候選人、對選舉介入，引發台灣內部對立紛爭，製造同情聲量與支持力量，最終戰略節點在感知的誤導改變，以致癱瘓政府決策、施政乃至兩岸的主導權、主動權。BT

AI 時代台灣產業結構之探討

編輯部

編按：本文係凱達格蘭基金會《新台灣國策智庫》經濟研究小組 2026 年 7 月 30 日「AI 時代台灣產業結構之探討」圓桌論壇會議紀錄摘要

目前台灣整體經濟很好，但也有一些問題，今年經濟成長率超高，出口破紀錄、貿易順差很多，整個經濟形成 K 型結構，電子等產業好的很好，其他產業有的很糟，傳統產業出口多數不好，有些產業則是表現平平；產業發展出現高度不均問題，特定產業好是不是完全是好事？相對於表現良好的明星產業，其他產業難免有相對剝奪感，因為人力及資源不均、相差懸殊；經濟變動很快也是問題，本來 PC、NB 就很受到重視，蔡政府 5+2 產業創新計畫，有機械、綠能、生醫、國防、農業、循環經濟與亞洲矽谷，就是沒有半導體產業，大概是因為認為產業已經成熟，但是後來擴大到 10 個產業就有半導體，蔡政府第二任期的六大核心戰略產業，就涵蓋 5G、資安；顯示政府的產業想像依賴硬體，到蔡政府時由硬轉軟，只是硬體產業的好消息不斷，資源很多但很難移轉到其他地方，現在 AI 一片大好也是硬體掛帥。

台灣經濟的特色如下：第一是「高度依賴製造業出口驅動經濟成長」，我國貿易依存度在全球名列前茅，經濟成長驅動多來自出口，台灣許多產業出口多到 7 成，以出口驅動產業很清楚，有效創造就業機會、帶動所得快速成長，這是世界上各經濟體少見的；台灣的經濟基礎傳統上只有灌溉與糖廠，賣米賣糖有資本經營輕工業，經濟不好就以出口解決，資源集中有時候是慣性使然，貿易條件不斷惡化、利潤不斷降低，慣性很大需要夠大的誘因才能由硬轉

軟，台灣賺的都是商品利潤，近年因為成本高、國際競爭加劇使貿易條件惡化，獲利壓縮難以帶動薪資成長，最終產業歷經防禦型對外投資，國內產業集中於中上游，標準化產品難以創造高獲利，加深薪資難以提升的困境；半導體等少數產業及關鍵零組件產業順利發展，提供高薪就業機會，卻也因為磁吸資源導致產業發展傾斜，造成薪資兩極化。

其次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出口政策與產業持續擴張，製造業蓬勃發展導致「五缺」問題，五缺一日不解決，結果就是產業空洞化，五缺問題需要透過市場與需求面解決，人力、土地、資本、電力、水利都有其限制，市場機制會使要素、資源價格上升，結果難免墊高成本，需求面就要調整產業結構，減少使用缺稀要素的產業發展，還要能夠發揮企業家精神以有限資源去創造新興產業；現在資源都被台積電吸走，人才、人力也都被洗走，傳產似乎只有退場的出路，中小企業最重要的就是退場機制，中小企業的自然退場可以考慮。第三就是「產業發展的矛盾」，資通訊產業發展愈大愈好，但是傳統產業要救、中小微型產業要生存，新型的軟體、太空、無人載具、綠能、生技、長照、文創等產業也要發展，要發展半導體也要兼顧傳產、要發展出口也要發展內需；賴總統提出三個「兼顧」，要注意資源的有效配置原則。

第四就是「AI 產業的外溢紅利問題」，半

導體產業藉由 AI 熱潮茁壯，百工百業是不是能夠蒙受其外溢紅利仍有待觀察，是不是能夠像石化產業的垂直分工，可以將利潤留在國內，現在的難題是如何透過稅收帶動百工百業升級，眾多無法透過 AI 提升價值的產業如何發展，如何因應勞動力減少與 AI 自動化取代人力之間的雙重趨勢。第五是「高度依賴特定產業」的問題，AI 泡沫化的風險與全球經濟前景，使得產業過度集中成為陰影，曾經統領全球的 IBM、GM、INTEL 已經式微，任何產業都難免 DECLINE、都有盛極而衰的命運，產業間的 SWITCHING COST 經常不易克服，我們高度依賴單一企業或產業需要有長期風險意識，我們要思考如何找到下一個護國神山。

AI 可以是破壞式創新，AI 會產生三種人，一是不用的人，跟不上的人，根本不會用的人；二是有使用 AI 的人，可以跟上 AI 的人；三是創造 AI 的人，有創造力的人；產業導入 AI 或 AI 化並不容易，企業是不是可以透過 AI 提升產值，商業服務業是內需，產業發展就是消費者付錢，商發署智慧化政策將有效果，AI 後會有新商業模式，新創事業的出現，AI 很好就會淘汰同業，是不是可能大家普遍都用，如何真正有成效，AI 會不會取代人力、產業衝擊如何都要考慮，有 AI 就要有電力，台灣每年的電力成長預測達到 2.6%，來自資料中心與半導體擴廠，未來用電會更加高速成長，天然氣發電成本高，能源安全問題關係到生產成本，事實上 2.6% 的成長率可能還是低估，AI 用電的成長可能極為驚人；能源管理法規定能源大戶要自備電源，把能源供應轉嫁給廠商，實際上業者多不願設廠發電，不只是成本與資源問題，還有生產安全問題、電力轉換問題、電力系統要如何準備問題，國內用電不穩等問題也要解決，如何平衡電力供應問題？電力不夠還要資料中心嗎？供電價格是不是太低，應該反映實際成

本，雖然物價穩定、中小企業都要靠電力低價，還是要估算電力成本，經濟才會穩定健康。

我們因為沒有加入區域經貿組織就容易面臨高關稅，台灣過去資通訊產品因為外移曾經緩步，IPHONE 出現使得台灣電子零組件重新發展；現在貿易順差在增加，但是產業類別卻在減少，可能過度依賴特定產品，產業高價值化發展是好事，但是價量的平衡安排要思考；已開發國家在全球化難免落入此情況，沒有競爭力的產業受到影響，長期下去就會像川普面對美國諸多產業逆差，或者甚至空洞化、不生產，國內要未雨綢繆如何妥適安排產業結構，許多傳產必須轉型，尤其大型傳產壓力更大，因為受到五缺問題影響很大，但是傳產僱用許多勞工，有區域平衡、收入分配的效果，如何協助它們轉型是問題，AI 智慧製造可以考慮、或者跨域合作發展，有機會切入未來的菁英產業，或者靠攏 AI、或者是不是更加靠近電子業，本業技術能量的維持有機會可以轉入新興產業；除了企業、產業 K 型化，國家、社會 K 型化也要注意，未來 AI 即使泡沫化，技術也會影響產業發展；電力即算力，能源型基礎設施要加強，使得產業可以繼續發展，未來產業方向的確定很重要，及早明確基礎建設的打造方向；廠商的韌性通常不一定要規模，高質化、客製化的營業規模可能不大，規模小則資源耗費少但利潤高，要以多元解決方案而不是靠產量解決。

台灣可能因應的思維首先是「產業結構與佈局要有長期思考」，要檢視各產業或廠商未來是不是具有競爭力，即使要維持傳統製造業也要以「高階製造」為目標，透過高階製造創造高薪就業機會，避免無實效、不必要的補貼或保護，善用市場機制引導資源投注於有長期效益的產業發展，產業的 RANGE 要適度開放、

更加廣泛。其次要「建立完善的產業生態系」，打造可以回應外在影響、關稅衝擊的產業環境，以產業多元化解決 K 型經濟趨勢，推展 5G 軟體產業、建立 5G 垂直應用系統，加強發展差異化產品製造。第三「優化 GDP 結構」，改變過去的製造業思維，出口不應該是以量取勝，廠商如果太多就會價格破壞、不容易賺錢，所以出口不是愈多就好，反而低薪、五缺都來自貿易依賴，是不是要改變過高的貿易比重，加強內需的零售、影視、餐飲、知識等內需消費，邁向先進國家的經濟結構、實質提高生活品質。

第四「支持擴張性對外直接投資」，加速對外投資，善用全球人才、知識與資源，延伸國

力與經濟力；國外投資生產可以分散風險，並進一步帶來產業優化調整。第五「強化創新精神和環境」，產業持續升級、差異化之外，創新的全新產品與產業創造更是持續發展的動力，加大支持創新能力與產業，善用台灣充沛的資金優勢。第六是「勞動力的優化」，良好的勞動條件需要建立在高技術水準與高資本累積上，具備高知識與技術含量的高階製造與服務業才是優化勞動條件的基礎，AI 的發展不必然不利於就業與勞動，AI 的善用也可能是產業與企業的利多。只要能夠維持經濟自主自足，即使少了國際貿易還是能夠擁有平安健康的生活品質，內外均衡、五臟俱全的經濟韌性就是最重要的經濟目標。BT



財團法人凱達格蘭基金會
新台灣國策智庫通訊

發行人：陳亭妃

總編輯：李明峻

副總編輯：張人傑、陳致中

執行編輯：林彥宏、蘇世岳

財團法人凱達格蘭基金會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 97 巷 1 弄 6 號 1 樓

電話：(02) 2531-6607 傳真：(02) 2531-6692